

代际视角下的葡萄牙华人移民现状

——基于多案例的质性研究

金阳敏

(丽水学院民族学院,浙江丽水323000)

摘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葡萄牙华人移民社会不仅历经了代际更替,而且随着不同类型的华人移民数量增加,其群体构成日益复杂化和异质化。华人移民群体在适应和融入葡萄牙社会过程中表现出了代际性差异。移民的家庭背景、移民动机、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资本等因素决定了移民一代的移民策略和融入现状,其影响延续到了移民二代。此外,华人移民二代在融入葡萄牙社会过程中也面临许多困境,而提高受教育水平是移民子女完成向上流动的关键。

关键词: 葡萄牙; 华人移民; 移民一代; 移民二代; 社会融入

[中图分类号] D75.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925(2022)03-0062-13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各国的华人移民研究日益多样化,相关方面的研究也颇为丰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法国和荷兰是欧洲国家中拥有华人移民数量最多的国家;从80年代开始向南欧国家扩张,90年代起东欧国家的华人移民数量也逐渐增多^①。浙江人、福建人和广东人是中国移民潮流向欧洲国家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中,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三个南欧国家以浙江人居多^②。这三个南欧国家的浙江人主要来自青田和温州等地。然而,近年来,受葡萄牙移民政策的驱动,来自中国其他省份的华人移民逐渐增多,葡萄牙华人社会的人口构成也逐渐复杂化。据学者们先前的研究,葡萄牙的华人移民主要由三个群体构成:第一,20世纪70年代来自葡萄牙前殖民地莫桑比克的华人移民,主要是广东人;第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来自浙江青田和温州的经济移民;第三,20世纪90年代澳门回归前来自台湾、香港、澳门等地的华人移民^③。从2012年开始,葡萄牙政府开始实行“黄金签证”政策,

【来稿日期】2022-02-07;【修回日期】2022-04-10

【作者简介】金阳敏,浙江丽水人,硕士,丽水学院民族学院助教,研究方向:西班牙和葡萄牙新移民,西语国家语言文化。

^①Pieke F.N. *Recenttrends in Chinesemigration to Europe: FujianeseMigration in Perspective*, Switzerl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forMigration, 2002, pp.11.

^②Beltrán Antolín, J. La empresa familiar. Trabajo, redes sociales y familia en el colectivo chino, OFRIM /Suplementos, 2000, 1(6), pp.129-153; Ceccagno, A. New Chinesemigrants in Ital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003, 41(3),pp.187-213; Oliveira, C. R. Chinese in Portugal: AnImmigrationCartography. in L. Fonseca(ed.) Immigranction and Place in Mediterranean Metropolises, Lisboa: FundaçãoLuso-Americanana para o Desenvolvimento, 2002, pp.229-254.

^③Santos Neves, M. and Rocha-Trindade, M. B. Diasporas and globalization – The Chinese business community in Portugal and the integration of China into the world economy,Migrações Journal, 2008, pp.155-163.

为了吸引投资应对经济危机，许多来自中国其他省份的投资移民通过购买当地 50 万欧的房产来获得葡萄牙居留权^①。据波尔图大学的一项研究统计，在“黄金签证”政策实施的五年内，葡萄牙为华人发放了约 3 680 份“黄金签证”，其中 2014 年发放了 1 235 份，吸引华人投资额 7.1 亿欧元^②。

根据 2021 年葡萄牙外国人和边境服务局（SEF）的数据显示，官方登记在册的中国籍移民有 27 839 人，是该国的第六大移民群体，其中半数以上分布在葡萄牙南部的里斯本，随后依次是波尔图（2 549 人）、塞图巴尔（1 909 人）和法鲁（1 845 人），其余的则分散在各个城镇^③。2000 年，葡萄牙的中国移民人数还只有两千多人，之后逐年持续增长，其中的主力军是借助地缘和亲缘纽带来葡萄牙的青田人和温州人。他们主要从事餐饮或者零售批发行业，在部分地区形成了华人较为集中的聚居区，如里斯本的马丁莫尼兹（Martim Moniz）区和波尔图北部的维拉杜孔德（Vila do Conde）等。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葡萄牙华人社会不仅历经了代际更替，而且近年来随着不同类型的华人移民数量增加，其群体构成更加复杂化和异质化。不同类型的华人移民在葡萄牙社会的生存现状如何？移民背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移民动机、移民时间和社会资本等因素对华人移民及其后代融入当地社会又有什么影响？

国外学者对葡萄牙华人移民的研究，较为集中地关注到经济层面的问题。特谢拉（Teixeira）较早地关注到葡萄牙华人经济移民，提出他们与流向欧洲其他国家的华人经济移民有着高度的同质性，同时，在不同的移居国又体现出不同的特点^④。有的研究则围绕华人移民在葡萄牙的经商策略和经济活动等方面展开，认为他们的经济活动与族裔资本紧密相连并随着中国经济全球化而发展^⑤。葡萄牙学者奥利维拉（Oliveira）指出，虽然华人移民的商业策略主要基于族裔资源，但是同时也反映出移民在融入葡萄牙经济过程中所受到的限制和面临的困难，依附族裔资源发展是族裔资本和当地劳动力市场的条件限制双向作用导致的结果^⑥。罗德里格斯（Rodrigues）基于对华人移民在里斯本和温州两地的田野调查，主要分析了浙江移民涌向葡萄牙的内在原因。她认为，浙江移民怀抱着在欧洲“致富”和“成功”的期望，是被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因素作用下产生的移民推力推动^⑦。

此外，相关研究关注了葡萄牙华人移民后代的社会适应和融入问题。丁宁（DingNing）对葡萄牙华人社会进行了概述并简要介绍了华人移民二代的情况^⑧。盖斯帕（Gaspar）认为葡萄牙的华人移民后代不

^① Gaspar, S.Chinese migration to Portugal: Trends and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2017, 13(1), pp.48–69; Gaspar, S. and Ampudia de Haro, F. Buying Citizenship? Chinese golden visa migrants in Portugal,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019, 58(3), pp.58–72.

^② 数据根据波尔图大学制作的纪录片《在波尔图大学的葡萄牙新一代中国人》(Nova geração de chineses em Portugal estudam na U.Porto) 整理获得。

^③ 数据来源为葡萄牙外国人和边境服务局（SEF）：[https://www.gee.gov.pt/pt/docs/doc-o-gee-2/estatísticas-de-imigrantes-em-portugal-por-nacionalidade/paises/china-1/3955-população-estrangeira-com-estatuto-legal-de-residente-em-portugal-china/file\[2021-11-03\]](https://www.gee.gov.pt/pt/docs/doc-o-gee-2/estatísticas-de-imigrantes-em-portugal-por-nacionalidade/paises/china-1/3955-população-estrangeira-com-estatuto-legal-de-residente-em-portugal-china/file[2021-11-03])

^④ Teixeira A. Entrepreneu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Portugal. In Benton G. and Pieke F.N. (eds.), *The Chinese in Europ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8, pp.238–260.

^⑤ Oliveira, C. R. Estratégias empresariais de origem imigrante em Portugal: oportunidades étnicas e estruturais e recursos pessoais. *Sociologia, Problemas e Práticas*, 2004, pp.71–98; Oliveira, C. R. *Empresários de origem imigrante: estratégias de inserção económica em Portugal*, Lisboa: ACIME, 2005, pp.15; Bongardt, A. and Santos Neves, M. *The Chinese business community at a crossroads between crisis response and China's assertive global strategy: the case of Portugal*, Italia: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Robert Schuman Centre for Advanced Studies Migration Policy Centre, 2014, pp.8; Bongardt, A. and Neves, M. 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business community in Portugal in the context of crisis and of China's “go global”. In Marco Sanfilippo and Agnieszka Weinar (eds.), *Chinese Migration and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2015, pp.106–139.

^⑥ Oliveira, C. R. La actividad empresarial china en Portugal: ¿Estrategias étnicas tradicionales?, *Revista CIDOB d'Afers Internacionals*, 2021, (92), pp.223–242.

^⑦ Rodrigues, I. *Migration and Social Aspirations: Chinese Cosmopolitanism in Wenzhou Region (China)*, Urban Science, 2018, 2(2), pp.32–48.

^⑧ Ding, N.A. *Comunidade Chinesa em Portugal. Acerea de Atividades Económicas, Associativismo, Integração e a Segunda Geração*, Master's thesis, Braga: Universidade do Minho, 2012.

仅复制或接替了上一代的生意，他们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把专业知识运用到家族生意当中，开拓不同领域的市场，成为葡萄牙和中国贸易往来的桥梁^①。

关于移民二代的社会融入问题，美国社会学家波特斯（Alejandro Portes）和美国华裔社会学家周敏提出了“分层同化论”（segmented assimilation theory），该理论以“资本”为核心，提出移民及其后代的三条社会适应路径。在移民“选择性同化”路径中，即有保留地吸收主流社会文化，又刻意保留本族群的族裔特征，并利用族裔资源优势最终融入中产阶级^②。波特斯及其团队于2012年在西班牙展开的一项纵向调查，以移民二代为研究对象，基于大量的实证研究数据，进一步论证了该理论对解释欧洲国家的移民二代融入问题时同样适用^③。作为葡萄牙的邻国，西班牙的华人移民社会特征与葡萄牙有高度的同质性，同样都是以浙江青田和温州移民为主，因此，相关研究具有很强的参考性。刘（Yiu）基于波特斯纵向研究的数据，分析了西班牙移民二代中高学历比例低的原因：在美国的华人移民二代平均受教育程度高，因此他们比在美国的其他移民二代经历了更大的向上流动；然而与之情况相反的西班牙华人移民二代，他们的教育抱负和成就都低于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二代，这是因为华人移民后代在学校和就业市场受到的歧视使得他们暂时改变适应策略，通过继承移民父母的资本，当小老板经商努力到达经济上的成功来获得社会地位的提升^④。

另外，最新的研究集中关注投资移民这个群体。华人投资移民主要来自中上层阶级，他们移民的动机是被欧洲的生活方式、气候和更优质的教育等方面吸引，与浙江移民是不同的两个群体^⑤。国内关于葡萄牙华人移民的研究几乎为空白，但是，国内许多研究聚焦了青田和温州侨乡的相关方面^⑥，并突出了浙江籍华人移民群体面临的一些共性问题，如侨乡留守儿童问题^⑦、华人移民子女面对歧视的感知和文化适应问题^⑧等。现有的研究未对不同类型的葡萄牙华人移民情况做进一步的比较分析，因此，我们试图通过多个案例的生活史访谈及参与式观察，分析不同类型的华人移民及后代受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移民动机、移民时间和社会资本等因素的影响在葡萄牙的融入和生存现状。

^① Gaspar, S. *Percursos migratórios e trajetórias de vida de descendentes de imigrantes chineses*. *Sociologia, Problemas e Práticas*, 2018, (87), pp.109–127; Gaspar, S. Chinesedescendants' professional pathways: Movingto new businesses?, *PortugueseJournalof Social Sciencee*, 2019,18(1), pp.91–108.

^② Portes, A. and Zhou, M.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Segmented assimilation and its variant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93,530(1), pp.74–96.

^③ Aparicio R. and Portes A. *Crecer en España: La integración de los hijos de inmigrantes*, Barcelona: Obra Social “La Caixa”, 2014; Portes, A., Aparicio, R. and Haller, W. Hacerse adulto en España: la integración de los hijos de inmigrantes, *Anuario CIDOB de la Inmigración*, 2018, pp.148–181; Haller, W. and Portes, A. Class and ambition in thestatusattainmentprocess: A Spanishreplicatio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9, 70(5), pp.1825–1849.

^④ Yiu J. Calibrated ambitions: low educational ambition as a form of strategic adaptation among Chinese youth in Spain, *SAGE Publications Sage CA*, 2013,47(3), pp.573–611.

^⑤ Amante, M. D. F. and Rodrigues, I. Mobilityregimes and the crisis: thechangingface of Chinesemigrationdue to thePortuguesegolden visa policy,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Studies*, 2021, 47(17), pp.4081–4099; El País: “España se consolida como paraíso europeo de las golden vida”, https://elpais.com/economia/2018/11/24/actualidad/1543053440_420218.html; Ampudia de Haro, F. and Gaspar, S. Visados dorados para inversoresenEspaña y Portugal: residencia a cambio de dinero, *Arbor*, 2019, 195(791), pp.a495.

^⑥ 韦丹辉：《20世纪80年代以来青田华侨华人社团职能转型分析》，《丽水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韦丹辉：《浙江青田籍华侨与侨乡文化的互动与变迁》，《八桂侨刊》2021年第4期。

^⑦ 徐辉：《青田县方山乡华侨留守儿童现状调查》，《八桂侨刊》2020年第4期；高哲,王晓雪：《侨乡留守与跨境抚养：在华生活的中国新移民子女群体的分异及嬗变——基于温州侨乡的田野调查》，《青少年研究与实践》2021年第4期。

^⑧ 李春清, 石雷山, 张骑：《华侨华人儿童对歧视的知觉及其文化适应——以青田欧洲华侨华人为例》，《八桂侨刊》2020年第4期。

二、葡萄牙华人移民状况

该研究中的案例主要来自 2019—2021 年间笔者对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华人移民的多点田野调查结果。在 2021 年 5 月到 10 月间，笔者对葡萄牙北部的华人移民进行了田野调查，调查地点覆盖葡萄牙第二大城市波尔图及其周边的城镇。在田野调查期间，笔者与当地的华人家庭同住，参与观察了他们的工作与生活。在田野调查过程中，运用生活史访谈、半结构式访谈的形式与他们进行了面对面的交谈，访谈的地点主要是他们的工作场所和家中。在大量的访谈对象中，笔者选取了 20 位在葡萄牙的华人移民一代和 10 位华人移民二代作为本项研究的案例。对案例中的 4 个华人移民家庭进行了代际流动视角的深入研究。案例中的移民时间从 20 世纪 80 年代覆盖到 2019 年。移民类型包括了浙江青田和温州等地的经济移民、上海等地的投资移民以及来自其他省份的其他类型移民（详见表 1）。移民一代的年龄在 21 岁到 69 岁之间；移民二代的年龄最小为 11 岁，最大的为 42 岁，其中，除了一位移民二代是土生土长的华二代，其余的都是在中国出生或葡萄牙出生又被送回中国，随后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来到葡萄牙，为了表述方便，在下文都归为二代表述（详见表 2）。

表 1 葡萄牙华人移民一代信息

案例	性别	移民年份	祖籍	移民类型	案例	性别	移民年份	祖籍	移民类型
一	女	1985	青田	经济	十一	女	2007	温州	经济
二	男	1993	青田	经济	十二	女	2007	四川	婚姻
三	女	1992	青田	经济	十三	女	2009	山东	经济
四	男	2000	青田	经济	十四	男	2010	青田	经济
五	男	2001	青田	经济	十五	女	2013	陕西	婚姻
六	女	2001	青田	经济	十六	男	2016	河北	投资
七	男	2001	青田	经济	十七	女	2017	温州	经济
八	女	2002	青田	经济	十八	男	2019	上海	投资
九	女	2003	青田	经济	十九	男	2019	上海	投资
十	女	2003	青田	经济	二十	女	2019	温州	经济

表 2 葡萄牙华人移民二代信息

案例	移民二代分类	性别	受访年龄	移民年龄	父母祖籍	职业
Nº1	1.25º	女	42	17	青田	三百店主
Nº2	2º	女	11	0	青田	学生
Nº3	1.5º	男	17	6	青田	学生
Nº4	1.5º	女	21	8	青田	三百店收银
Nº5	1.5º	女	21	9	青田	职员
Nº6	1.25º	男	25	14	青田	仓库工
Nº7	1.5º	女	36	8	温州	批发业老板
Nº8	1.5º	女	35	9	青田	物流公司老板
Nº9	1.5º	男	28	10	青田	餐馆
Nº10	1.5º	男	12	7	河北	学生

三、葡萄牙华人移民的策略与社会融入

华人移民在葡萄牙的分布有“小聚集，大分散”的特点，在里斯本和波尔图都有相应的华人聚居区。由于浙江经济移民占多数，所以大体而言，华人移民从事的行业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具体体现为餐馆和

三百店。近年来，随着传统行业趋于饱和，以及投资移民的数量增加，华人移民涉足的行业逐渐由单一转向多样，包括房地产和旅游业等都有涉足。这种转变也是华人移民结合自身条件，改变适应策略，融入当地社会环境的结果。本文中的案例主要是改革开放后出国的“新移民”，他们来自中国不同省份，移民动机、时间、方式都有所不同，在当地社会也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生存和融入状态。通过对不同类型移民的比较，可以看到华人移民因移民背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资本等方面的差异，在葡萄牙社会呈现出不同的融入路径。而相比移民一代，移民二代是受移民家庭影响被迫成为移民群体，他们在融入当地社会过程中需要面临的诸多问题与父母面对的问题不同。同时，移民二代的社会融入也离不开移民一代和移民家庭的影响，但在融入当地社会过程中移民一代和二代表现出代际性差异。

（一）第一代移民策略与社会融入

该研究中的华人移民所属群体主要可以分为四类：第一，从事零售和批发或者开餐馆的浙江移民，有强大的族裔资源，但受教育水平较低；第二，来自中产阶级的投资移民，受教育水平高，且经济资本也相对较高；第三，来自其他省份，与葡萄牙人结婚来葡的女性，受教育水平高，但社会资本相对薄弱；第四，东北移民，大多为下岗工人，缺乏移民亲缘网络，经济和社会资本相对薄弱。

浙江移民主要来自青田县和温州市管辖范围内的各个乡镇和村庄。他们来自传统侨乡，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在“走出去”的政策驱动下，陆续在欧洲各国建立起以地缘和亲缘为纽带的移民网络^①。浙江移民群体的主要特点是：家庭移民，跨国移民大家庭结构（多兄弟姐妹，移居欧洲各国）。作为家庭式移民，家庭成员的移民顺序通常是夫妻一方通过族裔资源购买身份，移民后打工直到符合申请家庭团聚条件，随后再为另外一方和小孩申请家庭团聚。待条件相对稳定后，再以滚雪球的方式帮助其他家族成员移民。

案例三：J，女，69岁，青田人，三百店店主。在20世纪90年代移民法国，在当地的华人制衣厂里做工。三年后，因为在法国申请不到合法身份，但正好赶上葡萄牙大赦，因此来到了葡萄牙。“我们家7个兄弟姐妹，我是老大，我出来后，就陆续把他们都带出来了。现在一个在西班牙，一个在法国，四个在葡萄牙。他们都有各自的家庭，基本都做生意，现在生活过得不错。”^②

案例二十：Z，女，35岁，温州人，三百店工人，两年前通过购买旅游签证进入葡萄牙，在一个已经来葡萄牙多年的亲戚的帮助下，开始在里斯本华人店里打工，等待身份合法化。“我是旅游签出来的，然后就留下来了。我有个亲戚在里斯本，本来说叫我过来就给我开一个分店。但是，问题是刚过来，语言也不懂，加上疫情这样子，怎么开店。所以只好先打工，如果这边情况好就留下来，不然就回去。开店都是要至少两个人的，要进货，要烧饭。我老公和儿子都还在国内，我跟我老公说这边太苦了，所以他现在不太想出来了。”^③

浙江移民在移民前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低，文化层次不高，移民前主要是打工或者工作不稳定。移民后因为语言障碍和文化水平低，主要是在族群内部谋生，如餐馆的跑堂、厨师、洗碗工、仓库工、三百店收银员、理货员和美甲店工人。而一些还未获得合法身份的移民，基本从事一些如家庭保姆、月嫂和按摩师等暴露风险较低的工作。不可否认，族裔资源和族群网络在一定程度上为这类移民提供了扎根前期的保护，为他们提供了积累经济资本的土壤。当然，这也是与移入国的移民政策是否宽松密切相关。葡萄牙的移民政策相对宽松，即使是非正常途径滞留的移民，只要开始正常工作并缴纳社会保险

^① Beltrán Antolín, J. The Chinese in Spain. in Benton, G. and Pieke, F.N. (eds.), The Chinese in Europe, Hounds Mills: Macmillan Press, 1998, pp.211–237; Li Minghuan, To Get Rich Quickly in Europe, in F. Pieke and H. Mallee (eds.),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Chinese Perspectives, Richmond: Curzon, 1999, pp.181–198; 郭剑波：《温州新移民出国特点简析》，《八桂侨刊》2006年第1期。

^② 源自2021年5月6日在波尔图对华人移民的访谈。

^③ 源自2021年5月23日在波尔图对华人移民的访谈。

和纳税，满足一定年限后就比较容易获得合法身份。在刚移民的前几年，移民的工作和居住地点通常都非常不稳定，哪里的工作待遇好、工资高就会选择去哪里，并将攒钱开店作为来欧洲的一个主要目标。许多移民即使积累了丰厚的经济资本，但是在生活上仍然非常节俭，主要也是在努力扎根当地社会过程中长年形成的储蓄习惯。但是，也有学者指出，有些移民在实现了经济资本的累积后，也会将购买消费奢侈品、开豪车、买别墅等作为对外宣告移民成功的表征^①。浙江移民中也有一部分是未婚的年轻人，他们家族中大部分都有人在国外，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出国“有门路”。相比已经有家庭的移民，单身移民的不确定性更强，他们在欧洲范围内流动的可能性也更高。

案例十四：X，男，30岁，青田人，三百店工人，2010年移民意大利，拿到居留权后来了葡萄牙。父母移民德国十几年，姐姐已经入了德国籍。“我当时是先去的意大利，然后很快就拿到居留权了。当时来葡萄牙是想开店的，但是葡萄牙语太难学，而且我发现这边中国店已经很多了，我又是一个人在这边，店是开不起来的。我的亲戚都在德国和意大利，他们生意做得很大。我现在在申请入葡萄牙国籍，入籍后就可以去德国和父母团聚了，他们年纪大了，能离他们近一点总是好的。”^②

与浙江移民同为经济移民的东北移民，他们的移民方式大多是通过“旅游签证”或者“考察团”等形式来到欧洲^③，之后在移入国打工直到获得合法身份，在这期间也许会在欧洲多个国家逗留。相比浙江移民，东北移民潮流向欧洲的时间更晚，而在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南欧国家已经形成了以浙江和福建移民为主的基本格局，所以东北移民的次族群资源相对薄弱。因此，也有许多东北女性移民选择和当地人通婚获得合法身份，并以此作为寻求在移入国社会地位上升的一种策略^④。但是无论是浙江移民还是东北移民，对于不会当地语言、受教育程度低且没有技术在身的移民而言，他们的扎根方式大多是帮其他华人移民打工，靠体力劳动获得报酬。有些浙江移民甚至从事农业劳动，种植中国的瓜果蔬菜满足葡萄牙和西班牙华人群体的内部需求。

案例七：Z，男，52岁，青田人，仓库区工人。2001年通过亲戚移民葡萄牙，其妻子移民意大利。几年后夫妻二人在葡萄牙团聚，开了一家小规模的三百店。但是，三百店的生意还不足以支撑他们一家四口的生活，所以他选择去华人仓库区当“牛工”，而妻子独自经营三百店，子女偶尔帮忙。“我不会语言，也没有什么本事，只能在仓库区扛货了。”^⑤

虽然华人移民的“家庭式”经营基本都与餐馆业和零售业、批发业相关，但是移民后的资本累积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具体体现为生意规模的大小。移民后产生的差异和移民前的家庭背景相关。移民前所具有的经济和社会资本更强，在移入国积累前期投资资本所需的时间相对更短。

案例十九：Z，女，42岁，温州人，服装店主，2007年来葡萄牙，姐弟二人相继来葡萄牙做生意。“我当时是不想出来的，但是我弟弟在国内做生意失败，想出国翻身。所以家里给了一大笔钱出来开店。我都没有去打过工，弟弟先出来开了三百店，我帮了他一年，就自己盘下了这家服装店，我在国内也是开服装店的。”^⑥

^①Rodrigues, I. Flows of Fortune: The Economy of Chinese Migration to Portugal, Doctoral Thesis, Universidade de Lisboa, 2012, pp.162; 李明欢：《“相对失落”与“连锁效应”：关于当代温州地区出国移民潮的分析与思考》，《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5期。

^②源自2021年5月15日在波尔图对华人移民的访谈。

^③赵晔琴：《身份建构逻辑与群体性差异的表征——基于巴黎东北新移民的实证调查》，《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6期；李明欢：《法国的中国新移民人口构成分析——以传统、制度与市场为视角》，《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④Sáiz López, A. Mujeres chinas en España. El capital social y su impacto en las estrategias productivas y reproductivas, Papers: revista de sociología, 2012, 97(3), pp.0591-612.

^⑤源自2021年8月31日在波尔图对华人移民的访谈。

^⑥源自2021年7月12日在波尔图对华人移民的访谈。

对于小规模的“夫妻店”，夫妻二人是主要劳动力，而且客源基本来自店铺所在区域附近的“老客户”。但是，中大型的三百店或者餐馆不仅为族群内部的移民劳动力提供了谋生机会，还为当地创造了一定数量的劳动岗位。华人移民经营的中大型店铺通常会采用“双轨制”，同时雇佣族群内和族群外的员工。“双轨制”指的是华人和非华人采用不同的报酬体系和工作时间。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第一，语言因素。华人员工语言不如本地人，因此需要有熟练掌握当地语言的员工负责和客户沟通。第二，工作时长。华人的三百店通常都会延长营业时间，但是非华人员工一般不会在延长的时间和节假日工作，因此华人员工就填补了这些时间段的空白，但是相应的薪酬也会比非华人高。第三，华人移民劳动力不足。因为葡萄牙华人移民数量有限且分散在各地，族群内部的劳动力数量并不能完全满足用工需求，因而转向族群外部寻求劳动力。笔者在田野调查中观察到，尼泊尔人、来自葡萄牙前殖民地的非洲人、葡萄牙人等都成为华人老板的雇员。来自不同族群的员工在同一个场所工作，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华人移民与族群外部人员的互动和交流，但是，族群的边界并没有因为这种互动消失。正如人类学家巴斯指出族群互动是划分族群边界的前提，而来自同一个族群的归属感是雇主和雇员之间信任的纽带，所以华人移民店铺里一些重要的岗位，如收银员，基本都是雇佣华人移民。

从 2012—2019 年葡萄牙实施“黄金签证”政策以来，中国移民占所有葡萄牙外国投资移民数量的首位，占总数的 54.4%^①。这些投资移民来自中国各个省份，移民前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中等以上，他们的移民动机也各不相同，主要为了寻求更宜居的气候环境或者为了孩子的教育等。大部分的浙江和东北移民在移入国从打工到个体经营再到扩大投资，都需要经历一个逐步累积经济资本的过程，这个过程有时甚至持续两代甚至三代人。但是投资移民的家庭背景相对更优越，所以在移入国经济层面的融入起点也更高。因为投资移民需要通过在当地购买 50 万欧元以上的房产来换取葡萄牙居留权且有一定投资限制，而葡萄牙旅游业发达，所以投资宾馆、民宿等是许多华人投资移民的首选。

案例十一：L，男，21岁，上海人，大学生，2019年来葡萄牙，通过父母投资移民葡萄牙。“我爸妈在这边买了一套房子，但是他们现在都还住在中国，有时候会过来。现在这边只有我一个人在这边读书。”^②

虽然投资移民在经济层面的融入起点更高，但是在融入过程中他们也会面临几个障碍，尤其是语言和社会关系网络。许多华人投资移民对葡萄牙的经济投资只占他们家庭投资的一部分，但是通过对葡萄牙的经济投资能够换取在申根区自由出入的“通行证”。因此，他们的跨国经济活动也相对更加频繁，跨国家庭的现象也非常普遍。具体表现为夫妻一方陪伴孩子在葡萄牙学习，而另一方在国内或者其他国家工作，或者由夫妻一方的父母移民帮助照顾小孩和生意。虽然投资移民的受教育水平相对更高，但是没有掌握葡萄牙语，仍然是他们短期内需要面临的一个障碍。第二个障碍就是比浙江移民和东北移民更狭窄的社交圈。浙江移民和东北移民在移入国都已经形成了以亲缘和地缘纽带为基础的社交网络，移民家族圈是他们情感归属和互动的重要场域。对于投资移民这个群体而言，一方面，短期内无法进入当地人的社交圈，另一方面，因为来自不同的地域和社会层次，他们与当地的华人移民圈也相对更疏离。

案例十八：M，男，69岁，上海人，退休干部，2019年通过投资移民和子女来葡萄牙，在当地投资经营民宿。“在这边太孤独了，我们这个年纪最怕的就是孤独。我老伴每天都和国内的朋友视频聊天好几个小时。这边哪有我们上海好，我们现在看到国内的那些老友，不是去这里玩就是去那里旅游，日子不要太快活。哪像我们，在这里受苦。养老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满足，还有精神和人文层面的。”^③

^①Amante, M. D. F.andRodrigues, I. Mobilityregimes and the erisis: thechangingface of Chinesemigrationdue to thePortuguesegolden visa policy,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021,47(17), pp.4081–4099.

^②源自 2021 年 5 月 28 日在波尔图对华人移民的访谈。

^③源自 2021 年 5 月 28 日在波尔图对华人移民的访谈。

不同的移民动机和移民家庭背景决定了不同类型移民在当地社会的融入意愿。对于浙江和东北的经济移民而言，通过勤奋努力工作，实现经济资本的累积是他们来欧洲的目标，而在未实现这一目标前“回国”会被视为“失败者”。但是，对于投资移民而言，因为葡萄牙经济在欧洲国家中相对落后，移民葡萄牙后的生活和移民前的美好想象存在着落差，他们的融入意愿和动机也会大大降低。此外，移民前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受教育水平决定了他们移民后对“异文化”和“他者”的不同感知，从而影响着他们的融入意愿。葡萄牙是欧洲国家中经济发展较弱的国家，2021年最低工资为每月665欧左右，邻国西班牙为每月950欧左右，而法国和德国每月都为1500欧左右。对于家庭经济背景较优渥的投资移民而言，他们甚至觉得欧洲的生活枯燥乏味，且认为“欧洲对我们来说不是天堂，对那些人（孟加拉移民、尼泊尔移民等）才是。”^①

除了上述两种主要类型的移民外，案例中还有来自其他省份的移民，主要是以和葡萄牙人通婚的方式移民，以女性为主。案例中的华人女性受过高等教育，有在欧洲其他国家学习的经历，因此，她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更强，掌握葡萄牙语所需的时间也更短。相比浙江和东北的经济移民以及投资移民，以婚姻方式移民的华人在文化层面的融入程度会更高。但是，在当地社会缺乏族裔亲属网络，拥有的社会资本相对薄弱，这些因素也会导致她们在移入国缺乏归属感。但是，归属感会通过下一代的诞生而得以产生并延续，从而在情感上与移入国产生更深的联结。

案例十二：C，女，42岁，2007年与葡萄牙人结婚移民葡萄牙。“我不像这边的某某（浙江经济移民），她的兄弟姐妹，整个家族都在这边。我的父母亲戚都在国内，然后这边老乡也非常少。虽然在这边这么多年，但是总有一种飘着的感觉，而且也是阶段性的，有时候很想回国，有时候又觉得这边好”。^②

总之，葡萄牙的华人群体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华人群体一样，都是充满复杂性且多元化的群体。对于浙江经济移民中的第一代移民而言，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实现经济资本的累积，努力扎根当地社会，为下一代融入当地创造条件。大家族跨国移民网络、族裔资源和家庭式移民都是他们能够扎根当地社会并在经济层面融入的有利因素。但是，移民前的家庭背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受教育水平是限制他们在文化层面融入的不利因素，其影响直接延续到移民二代。东北移民在经济层面的融入与浙江移民有相似之处，但是存在不同，次族群资源和移民背景等都是造成差异性的主要原因。葡萄牙的华人投资移民属于新的移民群体，移民前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受教育水平和移民方式是他们在经济层面融入的有利因素。但是，移民时间、语言和在当地的社交关系网络是暂时限制他们融入的消极因素，随着经济层面的融入以及语言等方面的改善，他们的融入程度将会更高。

（二）二代移民的移民策略与社会融入

欧洲的华人移民二代问题有很多的共性，如身份认同的矛盾、代际冲突、教育问题、中国文化的传承等。葡萄牙的华人移民二代同样会面临这些问题，移民二代的成长是在双重文化之间，在“我者”和“他者”之间构建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与身份。他们的融入与同化都是在“杂糅文化”的影响下，经历不断地冲突、矛盾、纠结、磨合、妥协的过程直到形成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身份”。在这过程中，家庭和“异文化”社会往往是反向拉扯的两端。但是，不同的家庭背景，移民一代累积的经济资本，父母的受教育水平，移民的迁入背景等都会影响移民二代的身份构建和同化结果。鲁本·朗博（Rumbaut）根据移民二代的出生国家及移民年龄将他们具体分为：1.25代移民（13到17岁之间移民），1.5代移民（6到12岁移民）和1.75代移民（0到5岁之间移民，对母国生活基本没有记忆）^③。在我们的案例中，

^①源自2021年9月29日在波尔图队华人移民的访谈。

^②源自2021年7月10日在波尔图对华人移民的访谈。

^③Rumbaut, R. G.Ties that bind: immigration and immigrant famil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Alan Booth, Ann C. Crouter and Nancy Landale (eds.), Immigration and the Family: Research and Policy on U. S. Immigrants,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7,

有 2 位 1.25 代移民，7 位 1.5 代移民和 1 位二代移民（葡萄牙土生土长），但为了表述方便，我们暂都用二代表述。通过对 10 位葡萄牙华二代的深度访谈并对 4 个华人移民家庭从代际层面的观察分析，我们试图呈现葡萄牙华人移民二代群体的生存现状及相关影响因素。

1. 移民二代的教育与向上流动

国内外学者都有关注到欧洲国家华人移民子女的高辍学率问题^①，同时也有学者指出华人移民子女反向（回国）教育流动的现象^②。这两种现象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因果关系，华人移民子女在移入国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这条路径受阻，因而转向母国寻求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但是，从整个欧洲华人移民子女这个群体而言，反向教育流动的移民子女仍然还是少数。反之，越来越多的华人投资移民为了子女的教育移民葡萄牙，“国内竞争太激烈了”“这边的国际学校的学费比国内的国际学校要便宜”“在这边孩子能轻松些”……是投资移民父母们自述的主要原因。通过案例，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同类型的移民家庭对子女在移入国的向上流动产生的不同影响。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是移民子女完成社会化并融入移入国的重要场域。部分华人移民子女在学校的融入失败，教育成就较低，因而在移入国的向上流动受阻。但是，族裔经济在当地的发展为他们提供了经济层面融入的可能路径。本文中的移民二代案例主要来自浙江的经济移民家庭，其中一个为华人投资移民家庭。通过案例分析，可以发现造成华人移民二代低教育成就（辍学或低学历）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移民家庭的影响因素。华人经济移民在移民前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他们为了改善生活选择能依靠“勤奋”和“体力”换来相对更高工资的欧洲国家打拼。家庭成员的“阶梯式”移民给移民子女带来了很大的不稳定性，尤其是在移民初期，有很大的可能性会面临生活和学习环境经常变动的情况。而有的父母选择将孩子留在国内，成为“留守儿童”，待工作和事业相对稳定后再把孩子接过来团聚，但这种“跨国拆分型家庭模式”也会给孩子的成长和教育带来很多问题。

案例 N°6：Z，男，25 岁，14 岁通过家庭团聚来到葡萄牙。出国时在国内上初一，移民后就读当地一家公立学校，读五年级，花了四年时间升到六年级，一直处于留级状态，直到最后放弃学业。母亲在葡萄牙经营一家小型的三百店，父亲帮华人打工。

“我当初出国的时候，以为只是过来玩一下，还会回去的，父母也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出国前我的成绩也不算很好，但是我英语比较有天赋，考试能考 95 分以上，还在杭州的国际寄宿学校上了两年，当时我妈还在意大利打工。来到这边后，老师上课完全听不懂，加上被学校同学欺负，我就很不想去学校，完全失去了学习的兴趣。”^③

“儿子 14 岁刚好处在叛逆期，而且在家乡的时候，爷爷奶奶管不住他，经常去网吧那些地方，来了葡萄牙开始读五年级，但是班级里的同学经常欺负他并且歧视他。所以他就不想去学校了，最后只能出来打工。”^④

父母和孩子早年分居两个国家，隔代教育，父母对孩子早期的教育参与较少，移民后生活和学习环境的巨大改变，学校里的歧视，这些都是造成移民二代学业受影响的负面因素。此外，移民后，移民二代在适应和融入学校环境过程中也没有得到来自家庭和学校适时的引导和帮助。

pp.3–46; Rumbaut, R. G. Ages, life stages, and generational cohorts: decomposing the immigrant first and second gener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004, 38(3), pp.1160–1205.

①陈勇，罗徽：《意大利华人华侨高中生子女辍学意愿调查与分析》，《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4 期；Yamamoto, Sumiko. School Success and Failure: Changes Seen in Children of Chinese Descent in Paris,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2015, 11(1), pp.56–70.

②张慧，张晓风：《华侨华人二代的反向教育流动与社会适应》，《社会学评论》2021 年第 4 期；MasdeuTorruella, I. Migrants' descendants and new mobilities between China and Spa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020, 58(3), pp.134–147.

③源自 2021 年 9 月 28 日在波尔图对华人移民二代的访谈。

④源自 2021 年 8 月 31 日在波尔图对案例母亲的访谈。

案例 N°3：Y，男，17岁，葡萄牙出生几个月被送回国由爷爷奶奶照顾，6岁移民葡萄牙和父母团聚。换了好几所学校，从公立到现在的私立，成绩不好，停学了一段时间，目前就读职业高中，打算放弃学业。父母经营中等规模三百店。

“我是我们班唯一的一个中国人，刚去的时候我什么都听不懂，也不爱说话，他们还以为我是个哑巴。班级有几个同学老是在背后说我，还笑话我之类的。所以我就不太喜欢他们，也不太愿意跟别人交流，感觉压力很大。（提问：你是否有和父母说过学校里发生的事情？）和我爸爸是不可能的，他整天就是工作工作，星期六和星期天也是，然后很容易发脾气，所以我不会和他说这些。妈妈的话我跟她说过，她就说她也上过学，知道学校里的事情，我再跟她说我不开心啊什么的，她就说你别说了，她听不懂。我也和老师说过，他们有时候就会和葡萄牙同学说一下这样子，但是也不会对他们怎么样，所以基本上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①（案例母亲）“我儿子有和我说过学校的事情，但是我们又不懂，也不能做什么。语言也不好，也没办法和学校沟通。”^②

在移民二代的自述中，他们经常会用“他们（父母）整天只知道赚钱”“不会管我学校的事情”“都是我自己管我自己”等字眼表达对父母的不满和不理解。从移民父母的角度来说，一方面，他们在移入国的首要任务是立足当地社会和累积经济资本，不论是打工还是开店都需要面对很多的不稳定因素，且会花去他们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会对孩子的生活和学业有所疏忽；另一方面，即使知道孩子在学校受歧视的状况，他们也没有能力去干预和改变，所以选择回避的态度去面对孩子受歧视的问题。

第二，学校环境的影响。葡萄牙的义务教育是6—18岁，分为三个阶段。根据办学性质，学校分为三类，即公办学校（占82.6%）、私立学校（占13.4%）、半公半私学校（占4%）。在整个葡萄牙华人移民群体中，也存在着很大的分层。对于家庭经济状况好的移民家庭，会把孩子送到好的私立学校，甚至美国或英国国际学校，而对于条件一般的家庭，会就读住家附近的公办学校。许多投资移民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孩子的教育，因此大部分投资移民会选择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

“我在国际学校教过一年书，里面的学生大部分都是葡萄牙本地人、巴西移民后代和中国移民后代。中国移民小孩有一部分是黄金签证出来的投资移民，属于家庭经济条件很好的。国际学校的学费一个月就要1000欧元，加上其他费用，不是一般的家庭能够承受的。国际学校的氛围和公办学校完全不同，他们享受的都是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对中国学生的歧视也会少很多。”^③

案例 N°10：M，男，12岁，7岁随父母移民葡萄牙，就读当地的美国国际学校。“我儿子在美国国际学校，学习很轻松，但是学了很多很多家长希望学到的东西。比如足球，篮球，排球，打击乐，小提琴，手工，绘画……他还自己研究量子力学，和三个同学一起写论文。”^④

移民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融入的层次。对于移民前，经济条件较弱的移民家庭，他们移民后接触和融入的层次也相对较低。公办学校与普通私立学校、国际学校在学生背景、师资力量、教学水平等方面都存在不小的差距。对于许多有中国生活和学习经历的移民二代而言，在不懂葡萄牙语的情况下，要适应完全不同的两个学习环境和教育体制更是不小的挑战。

第三，社会环境的影响。学校和家庭环境对移民二代的教育成就获得至关重要，而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能否为他们提供通过教育获得向上流动的空间是决定移民二代获得高学历期望值的重要因素。“我们华人要想考这边的公务员是很难很难的”“书读出来最多就是帮华人做会计或者律师”“银行里亚洲面孔都看不到，黑人倒是有”“他们自己国家的年轻人都找不到工作”等是许多华人移民对葡萄牙社会就

①源自2021年7月23日在波尔图对华人移民二代的访谈。

②源自2021年9月16日在波尔图对案例母亲的访谈。

③源自2021年9月21日在波尔图对国际学校老师的访谈。

④源自2021年7月5日对案例父亲的访谈。

业前景的解读。另一方面，华人移民在当地都是经商居多，移民家庭能够为二代提供这方面的基础和资源，而且通过在当地经商或者帮华人打工获得的收入可能还要高于普通职员的薪资水平（虽然前者可能也要面对更大的风险和不稳定性）。因此，许多父母认为“书读出来有什么用”“书读出来还不如我们开店赚钱”等，而族裔经济和族裔资源为在学习方面碰壁的移民二代提供了缓冲的机会和保护。但是，以餐饮业和三百店等零售业为主的族裔经济能够为这类移民二代提供的向上流动途径是有局限性的。在我们的案例中，成年的移民二代从事的都是和父母相同或类似的职业，都与三百店或餐馆相关，移民一代的职业特性延续在了移民二代身上。

案例 N°9：Y，男，25岁，8岁移民，初中学历，接替父母餐馆生意。父母移民葡萄牙二十几年，开中餐馆^①。

案例 N°4：M，女，21岁，8岁移民，职业高中辍学，目前三百店打工。父母在2000年左右移民，从帮别人打工到自己开店做生意，目前经营一家三百店^②。

总而言之，葡萄牙华人移民二代群体中的低教育成就（辍学或低学历）是在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多方面影响下造成的结果。华人移民在当地族裔经济的发展和族裔资源的壮大为移民二代提供了在经济层面融入的其他路径。但是，经济资本的累积只是为移民后代的向上流动提供了基础，只有通过提高受教育水平才能将经济资本转换为文化资本从而实现经济资本的再生产和延续并实现向上的流动。

2. 移民二代的社会融入困境

案例中的移民后代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移民二代，除了一位是土生土长的移民二代外，其余的都有在中国生活的经历（最小的移民年龄为6岁，最大的为17岁）。因此，他们从语言、行为模式、价值观认同等方面与土生土长的移民二代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当然，这种差异性并不仅仅是出生国家和移民年龄决定的，还与移民家庭背景、移民后的生活和学习环境等因素相关。同化的衡量标准首先就是语言、价值观、宗教和行为模式规范与准则等。“经典同化论”认为移民将逐步抛弃原有的文化和行为模式，学习新的文化和行为模式从而达到同化的目的，并最终失去原有的族裔身份；而“分层同化论”提出了借助族裔社区和族裔资源达到“选择性同化”的可能性^③。葡萄牙华人移民群体中新移民占多数，大部分家庭还是由移民一代和二代组成，部分形成了未成年的三代。因此，对于需要三代完成的同化路径还有待时间去检验。但是，通过案例分析，我们依然能够观察到移民后代的同化趋势和面临的主要困境，主要表现在语言、价值观和身份认同三方面。

第一，“母语”的困境。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汉语的学习过程就是逐步了解中国文化、认同母国文化并构建身份认同的过程。移民二代的汉语输入途径主要来自家庭和中文学校。在族裔资源强大的地方（如华人聚居区），拥有资源较为丰富的中文学校，移民二代可以通过周末在中文学校学习，与其他华人移民二代沟通从而促进汉语的学习并建立起群体归属感。但是，许多华人为了避免族群内部的生意竞争，选择在华人较少的地方开拓生意。对于这部分华人家庭的二代而言，当地薄弱的族裔资源对他们的汉语学习是不利因素。况且，会说汉语并不等同于了解和认同中国文化。父母的受教育水平、移民家庭的社会网络、父母希望孩子学习中文的意愿、移民家庭的语言环境、学习汉语的时间等因素都会影响移民二代的汉语掌握水平及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此外，在学习汉语的基础上，关键还在于移民二代能否建立起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和身份认同。在田野调查过程中，许多笔者接触过的华二代都会有这样的困惑“我的中文不好，葡萄牙语也一般般，真不知道以后能干什么”“如果我现在回中国，肯定跟不上

①源自2021年5月至10月在波尔图田野调查记录。

②源自2021年5月至10月在波尔图田野调查记录。

③周敏：《美国社会学与亚美研究学的跨学科构建：一个华裔学者的机缘、挑战和经验》，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9页。

的，不仅仅是语言问题”^①。移民二代觉得自己的汉语水平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不如国内的“竞争者”，而面对“本地人”，他们对自己的葡萄牙语又是不自信的。“中间人”的尴尬处境对移民二代的职业选择和发展、学习动机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外，虽然相比欧洲其他国家，在葡萄牙，中国人受歧视的现象相对不明显，但是大部分移民一代和二代都表示多多少少都有过被歧视的经历和感觉受歧视。因此，移民二代能否通过“选择性同化”路径融入葡萄牙主流社会，即有保留地吸收主流文化，又刻意保留本族群的族裔特性和文化并最终融入中产阶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移民二代能够达到的教育成就，而语言是最直接的影响因素。

第二，代际价值观的冲突。随着华人移民在葡萄牙的生活时间变长，吸收当地的文化并被西方价值观影响是不可避免的过程。但是移民一代和二代被移入国主流文化同化的速度是不同的。移民二代的移民年龄不同，被西方价值观影响的程度也不同。西方崇尚的是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而这与移民一代在母国形成的价值观有所冲突，如“孝顺”父母、节俭和储蓄的重要性等。

案例九：Y，女，42岁。移民葡萄牙近20年，家中三个孩子，小女儿在葡萄牙出生长大，大女儿和二儿子分别在8岁和6岁与父母在葡萄牙团聚。“他们把欧洲这边不好的都学来了，然后丢失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部分。我大女儿觉得我把他们生下来，辛苦工作养活他们就是我的义务，是我的任务，但是他们没有义务回馈父母”。^②

当然，移民家庭中两代人价值观的差异并不仅仅只是移民带来的影响，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变化，不同年代的人之间本就会产生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但是，对于移民家庭而言，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加剧了代际冲突。不同的文化成长背景甚至导致了移民一代和二代之间的代际隔阂。此外，移民二代年幼时与父母长期分离的经历也是造成代际关系疏离的原因之一。

第三，身份认同的矛盾。“我觉得我既不是葡萄牙人，也不是中国人”“你再怎么变，也永远是一张亚洲脸”，这些来自移民二代的自述，体现了他们身份认同的矛盾。移民二代的身份构建非常复杂，它是一个长期变化的过程，虽然在成年后能够到达相对稳定的状态。但它和移民二代的移民年龄、生活环境、家庭背景、受教育水平、语言等都相关。移民二代的身份认同不仅仅是二元论下认同自己是“葡萄牙人”或者“中国人”，它是吸收了多元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一种“杂糅”的身份。移民二代的身份认同是他们在融入当地社会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产物，同时，身份的构建和文化认同又能反向影响他们的融入和同化。从父母的角度而言，他们希望子女能够“像”自己，即在价值观、行为模式规范和准则等方面通过家庭教育得到传承。但是，许多移民二代在价值观等方面与父母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差异，因而他们并不愿意继续父母的家族生意，也不愿意像他们那样“剥削”自己拼命工作。

四、结论

综上所述，葡萄牙的华人移民群体是一个异质性且多元化的群体，也是受移民政策驱动和祖籍国经济发展影响下动态变迁的群体。移民来源地、移民动机、移民年代、代际差异等都是后续研究中需要关注的方面。本文中的案例也未全部覆盖葡萄牙华人移民群体中的各类人群，他们主要是改革开放后出国的“新移民”。浙江的经济移民借助族裔资源和大家族跨国移民网络，从底层打工到自主经商，以累积经济资本作为移民欧洲的首要目标。但是他们移民间的家庭社会地位和受教育水平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在文化层面的融入程度。东北移民与浙江移民的融入情况相似，但是他们相对薄弱的次族群资源使得他们扎根当地社会的过程更加艰难。婚姻移民多以女性为主，以和当地人通婚的方式移民，她们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随着在移入国的时间变长及后代的产生，其融入程度也将更高。投资移民是属于新的移

①源自2021年5月至10月在波尔图田野调查记录

②源自2021年7月9日在波尔图对华人移民的访谈。

民群体，他们拥有较好的经济条件和受教育水平，为了孩子的教育和更宜居的气候条件等原因选择移民葡萄牙。因此，他们在经济层面的融入起点更高，但是因为“黄金签证”的特点，跨国家庭的模式也非常普遍，而跨国生活的模式也可能导致他们融入当地社会的意愿不高。但从长远角度来看，投资移民家庭所具有的社会资本、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不同的移民动机决定了他们及其后代与浙江和东北经济移民不同的融入路径和生存状态。

移民二代的融入程度离不开移民家庭背景的影响。移民家庭的特质，移民父母的资本累积和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影响着移民二代在葡萄牙社会的融入程度和同化路径。在葡萄牙华人经济移民家庭中，移民二代（特别是1.5代移民）教育成就较低（辍学或低学历）的现象比较突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家庭因素、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移民家庭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给移民子女的学业造成了负面影响。对于家庭经济资本薄弱，教育成就较低的1.5代移民而言，他们在当地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更加依附族裔经济。同时，成长在葡萄牙的移民二代在被当地主流文化同化过程中，在价值观等方面与移民父母存在差异也是不可回避的事实，这也是有些移民家庭出现代际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而对于土生土长在葡萄牙的华人移民二代而言，葡萄牙才是他们熟悉、具有归属感的“家”，而父母口中的“家乡”是一个陌生、遥远、去过几次的地方。当然，移民二代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也与个体的生活经历差异、与华人社区关系的紧密程度相关。移民二代群体中产生的身份认同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在后续的研究中应该更加关注产生这种差异性的原因，从而增强他们对祖（籍）国的认同感。最后，从代际流动的视角来看，移民二代要实现向上的社会融入，提高受教育水平是关键。

（责任编辑：黄文波）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Immigrants in Portugal from an Intergenerational Perspective –Qualitative Research Based on Multiple Cases

Jin Yangmin

(Faculty of Nationalities, Lishui University, Lishui, Zhejiang 323000)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the Chinese immigrant society in Portugal has undergone intergenerational changes. Its group composition also has become more complex and heterogeneous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different types of Chinese immigrants.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have showed in Chinese immigrants' community in the process of adapting and integrating into Portuguese society. Factors such as the family background, motives,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immigrants' social capital determine the first-generation immigrants' migration strategy and integration status, and their influences continue to the second-generation. In addition,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Chinese immigrants faced many difficulties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ng into Portuguese society. Improving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 level is the key to complete upward mobility in local society.

Keywords: Portugal; Chinese Immigrants; First-generation Immigrants; Second-generation Immigrants; Social Integration